

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“双十节”纪念

周 游

(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, 上海市 200241)

摘要:“双十节”作为武昌起义纪念日,不仅是人们延续和重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,也是政府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时域。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,为了训政的需要,“双十节”纪念趋于“党国”化,不仅“党国”符号大量出现于纪念活动中,原先纪念中叙述先烈的历史也逐渐被国民党的建国历史所代替,党与国紧密结合在一起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国难日益加重,国民政府在“双十节”纪念活动中对救亡予以凸显;与凸显救亡相伴随的是,民族复兴问题也在“双十节”纪念中得到了强调,国民政府不仅将辛亥革命阐释为民族复兴的端始,还提出具体的复兴民族之方策。

关键词:“双十节”;国民政府;党国;救亡;民族复兴

中图分类号:K257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5315(2011)05-0027-05

国庆节是意识形态色彩颇浓的政治符号,意识形态的变化在节庆的活动和诠释中常常会有及时的反映,民国时期的“双十节”纪念^①便是如此。民国初年,共和肇造,北京政府以“共和”诠释“双十”,革命党虽曾一度认同此解释,却貌合神离。待“宋教仁案”发生后,双方交恶,“革命”成为国民党的核心价值。国民党在南方建立革命政权后,“双十节”的意义更由一般性的“革命”,发展到与党的系谱相联系的强势符号^[1]。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,由于国民党开始以党领国,进行党国一体的训政,“双十节”纪念又增加了新的元素,并随国内外形势演化而出现新的变化。

一 “双十”纪念的“党国”化

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为了训政的需要,“双十节”纪念趋于“党国”化,“党国”符号大量出现于纪念活动中。

如 1927 年国民政府“双十节”纪念程序中,就设

有“全体向党国旗、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”,“恭读总理遗嘱”等仪式,并有中央党部代表、国民政府代表、各团体代表分别演说“革命”历史的内容^[2]。在国庆阅兵中,也有“全场向党国旗行礼,主席恭读总理遗嘱”这样的仪式;而且到场观礼者,除党国要人外,还有南京农工商学妇女各界代表及外宾,共 5 万余人^[3]。国民政府借“双十节”纪念之机,通过“向党国旗敬礼”、“恭读总理遗嘱”、演讲国民党革命史等内容,使每位“演员”和“观众”都感受到“党国”的在场,受到“党国”符号的洗礼。

就连招待外宾、海军下水的仪式都充斥着“党国”符号。如 1929 年国庆节,广东省府在招待外宾中即设有“唱党歌”、“向国旗党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”、“恭读总理遗嘱”等仪式^[4]。1932 年,江宁海军借“双十节”举行舰艇下水典礼,礼台上高悬孙中山遗像及党、国旗,而且在水下典礼中还要向“党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”^[5]。

收稿日期:2011-05-20

基金项目: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“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”(项目批准号:09JZDW004)系列成果之一。

作者简介:周游(1984—),男,陕西西安人,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2011 级博士生,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。

民间“双十节”纪念也有“党国”化的表现。1928年,上海盛德造纸厂庆祝国庆,设有“恭读总理遗嘱”、“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”等仪式^[6];1929年,“俭德储蓄会”在纪念“双十节”中,亦有“行最敬礼”、“读遗嘱”的内容^[7]。在“双十节”纪念中,国民党意识形态和“党国”符号的渗入,是其取得全国政权后,对下层进行“党国”化的开始。

比较突出的是,民间纪念多由政府组织,或有政府人员参与,单独纪念非常少见。1930年,上海市商会纪念“双十节”,大门口悬总理遗像,二门悬“党、国”旗,主席台正中也悬总理遗像与“党、国”旗;纪念仪式中,有“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”、“主席恭读总理遗嘱”等内容;大会主席潘光展在演讲中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困难与成就作了简述,然后提及当下任务,希望民众拥护中央“和平统一”^[8]。

除纪念活动外,纪念场地也打上了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烙印。孙中山去世后,各地普遍建立中山公园、中山纪念堂等纪念场域,每到国庆,政府便会组织民众来此庆祝;而奉安大典后,中山陵更成为国民政府纪念国庆的重要场域。1936年“双十节”,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在中山陵前合并举行国庆典礼,中央党部以上干部、国民政府及所属文武高级官员均一律前往纪念,纪念仪式中除“唱党歌”、“恭读总理遗嘱”外,并有谒陵瞻仰孙中山遗容等仪式^[9]。在中山陵举办国庆纪念典礼并进行谒陵仪式,是国民党对国民宣传其意识形态、进行“党国”教育的很好时机。孙中山有“党父”、“国父”之誉,国民党、三民主义皆为孙中山的遗产,中山陵又是国民党一个巨大的政治符号,在中山陵前进行国庆纪念,把国家的最高庆典和对“国父”的拜谒结合在一起,使参观者身临其境,感受到“党国”的威严,对其产生一种崇敬。

在“双十节”纪念话语中,也有“党国”化的表现,原先纪念中叙述先烈的历史,逐渐被国民党的建国历史所代替,党与国紧密结合在一起。1929年“双十节”,广东省党部在“告国民书”中就表示,18年前的今日,本党同志在孙中山领导下,掀起革命高潮,推翻满清统治,建立民国^[10]。1931年“双十节”,南京市党部在“告同胞书”中也表示,20年前的今日,是“本党”同志在武昌首义,推翻满清,使中华民国屹立于世界^[11]。

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,但在国民党人的表述中,革命的三民主义并未实现,国民革命犹待完

成。蒋介石在“双十节”中就强调,“北伐既告段落,革命犹待成功”^[12]。贾伯涛也表示,中国国民党负着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,因此国民革命一日未能成功,“本党的历史使命,一日没有完成”^[13]。但与军政时期相比,训政时期的革命任务是有差别的,熊式辉指出,以前革命是要“唤起民众”,是“革命党人的革命”,现在则是“革命党人领导民众的革命”^[14]。在国民党哪里,训政时期是国民党“以党领国”,做全民导师的时期,也是凸显“党国”的开始。1928年《民国日报》社论表示,是年“双十节”最可庆之处,在于推到军阀,国家统一,“奠国家于党治之下”^[15]。蒋介石也谓纪念“双十节”,“必须惩前毖后”,本着“以党救国、以党建国、以党治国”之精神,“处处以党的力量为核心”,共建一个“新中华民国”^[16]。对“革命”与“党国”的强调,一方面是对国民党领导辛亥革命进行强调,凸显“革命建国”、“以党建国”的合法性;另一方面是对当下国民党地位与继续国民革命的强调,以展示“以党治国”的合理性。

二 “救亡”的凸显

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,本是励精图治、复兴中国的良好开端,但“九一八”后国难日益加重,救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,“双十节”纪念和话语也出现了新的变化。

由于处国难之中,本应欢庆的国庆节也变得日益冷寂。1931年,南京市党部表示,国难要示国哀,因此“双十节”是日,除举行庆祝集会外,“宴会娱乐,自应停止”^[17]。1932年“双十节”,南京市“气象冷落”,除悬国旗外,很少有别的点缀;往年各游艺场所必“勾心斗角”,以“出奇制胜之游艺”来吸引观众,今年则“气象如常”,甚或比平时更加冷寂;各机关照常上班,学校照常上课,均显严肃之气象;孙中山陵园循例开放,但瞻仰总理仪容者寥寥^[18]。1933年“双十节”,国民党中央以国难期间,不应铺张浪费,庆祝礼节一切从简;国府甚至因国难未除,对外宾也不予招待^[19]。

国难方殷的情况,在“双十节”纪念对联、标语口号中也有体现。1931年,国民党中央“双十”纪念会,中央党部第一门首横贴为“国庆20周年纪念大会”,旁联为“在国难中热烈纪念国庆,务须下必死决心,共赴国难”,“要国庆后永远消除国难,只有做最终的奋斗,光大国庆”;第二门横额为“团结奋斗”,旁联为“领导国民”、“巩固国基”,意义“颇为警切”^[20]。

1931年,南京市“双十节”纪念,就有反映救亡的口号,如“打到日本帝国主义”、“全国同胞团结起来”、“纪念国庆要誓雪国耻”^[17]。1934年,上海市国庆纪念,也有“准备实力收复失地”,“纪念国庆,要努力抗日雪耻复仇”等标语^[21]。

政府还利用“双十节”这一特殊时间,凝聚民心,进行抗日宣传。1931年“双十节”,南京市党部令各区党部、各民众团体组织宣传队,按宣传大纲要点,进行抗日救国宣传^[17]。在政府的号召下,各地民众纷纷响应。学联抗日会扩大宣传抗日,由各校分任演讲;武汉各校抗日宣传队均成立,定10日出发,分头工作^[22]。杭州各界召开庆祝大会,通过要案四件,并通电全省民众,若日寇侵入浙境,即组织义勇军予以痛击,继而杭州全市民众还举行对日经济绝交总宣誓^[23]。芜湖也召开各界抗日大会,号召全芜民众抗日,“誓灭倭奴”^[24]。

除纪念活动外,纪念话语里更是充斥着救亡的声音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1931年“双十节”发布“告国民书”,强调要本着辛亥革命的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,凝聚整个民族力量,以抵御外辱^[25]。刘峙在纪念文章中表示,孙中山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,以三民主义领导国民革命,武昌举义,海内景从;而于今天之危境下,应认识到总理的昭示,国人要执着于国民革命的目的,消灭专制,“攘除外事”,“摒绝人祸”;只有执此信念,才能“解决空前之国难”,“而此后亿万年之双十,每逢国庆必为国安国乐”^[26]。

在高呼救亡的同时,国民党也从具体方面入手,为救亡开出药方。在1932年南京市党部“双十节”纪念会上,大会主席朱芸生表示,“惟本党同志,齐心协力,负此重任。如迅速剿灭赤匪,以除内部祸患,努力提倡国货,以免利权外溢,振兴全民教育,发展地方自治,以奠定国家基础”^[27]。孙科也指出,当前的国难,“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问题”,而是一个与内政密切相关的问题;一方面要增强全国的实力,做外交的后盾,一方面按建国大纲规定实施训政,而非尽快实施宪政^[28]。还有人从发扬辛亥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方面开出药方的。邵元冲在立法院国庆纪念会上指出,“双十节是我们恢复中华民族地位的日子,并且表示中华民族有抵抗外辱的能力,有努力奋斗的精神”;这种精神,不仅是辛亥革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精神,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;在中国历史上,有“齐襄公复九世之仇”,“管仲攘夷以保证

中华民族的地位”,还有五胡乱华,元、满族人对中国的统治,但是“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”,保证了这个民族的存在;因此,我们应发扬辛亥革命精神和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,以抵御外辱^[29]。叶楚伦撰文指出,总理领导革命的时期,每天都在“死中求生”中经过,“然而本党以死中求生的精神”,找到了一条有生命的道路,这就是武昌起义;自从“九一八”后,又到了第二次“武昌起义”的时候,“我们还是以历史上给我们的精神,来解决这个问题”^[30]。

除此之外,《中央日报》“双十节”社论从民族国家认同上予以强调,社论指出:过去20年混乱之源,在于民众不知有民族、国家,更没有民族与国家的自尊心、自信心;补救之道,最重要的是使民众有民族、国家观念,有民族、国家的自尊心、自信心;各界只有深明此道,知耻而“振作”,以竭力扫除国难,这样才“犹有国家,犹有国庆”^[31]。

三 对民族复兴的强调

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国人的国梦,但因民初军阀裂地为雄,内乱不息,民族复兴无从谈起。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,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可能,而“九一八”后民族危机的加剧,更激发了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^②。这一问题在“双十节”纪念中也有体现。

辛亥革命的定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。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,纪念辛亥革命也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。在1929年国民政府“双十节”纪念标语中,辛亥革命就被定位为“中华民族的复兴”^[4]。在是年的党务报告中,国民党表示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由酝酿而“勃然以起”的最有力表现,也是民族复兴运动从兹开始,转入新时代的“大转机”^[32]。

国民党在此时期的表述里,也将孙中山的未竟之业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。1934年“双十节”,南京各界举行纪念会,邵元冲在演讲中对辛亥革命的表述定位已异于以前,他表示辛亥革命时,总理一个人先知先觉,“提倡中国革命,求中国民族复兴”^[33]。在邵元冲的表述中,孙中山提倡革命,已不只是以前强调“求国家独立”等话语,而是带有时代感的“民族复兴”。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国庆纪念会上也表示:“我们从今天起,格外要认识自己所负的革命责任,要立志继续总理和一般先烈的遗志,来实现主义,完成革命,以湔雪过去一切的耻辱,复兴我们中华民族。”^[34]^[540]

何以将辛亥革命定位为民族复兴的纪念日?国

民党有自己的理据。在1930年“双十节”宣传要点中,国民党列出了辛亥革命的四点成功之处,即“使国内诸民族一律平等”、“打破帝国主义者瓜分共管中国之迷梦”、“深植民主共和政体的根基”、“为恢复与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创造”了力量,故10月10日之国庆纪念“实为中华民族复兴之一大纪念”^[35]。

国民政府将辛亥革命定位为民族复兴的端始并予以凸显,在“双十节”纪念活动的对联中也有体现。1933年“双十节”,国民党中央、国府联合举办国庆纪念会,在纪念会当日,中央党部大门扎有柏叶牌坊一座,上悬红纸横额一副,书“国庆第二十二周年纪念会”;左右悬对联一副,上联“纪念国庆要维护统一永绝内乱巩固国家基础”,下联“纪念国庆要坚定意志抗御外侮争取民族生存”;会场主席台横额书“复兴中华民族”,上下联分别为“振发无畏精神冲破严重国难”、“赞助革命政府努力复兴事业”^[36]。可见,在本年纪念中,国民政府不但凸显“救亡”,也对“民族复兴”予以强调。

而且,国民党人在“双十节”的演讲、文牍中,对“民族复兴”也予以彰显。1935年“双十节”,南京各界举行纪念会,大会主席周伯敏在演讲中指出,与辛亥当年的中国相比,中国正在“走上复兴之路”,“目前的国难严重,不过表示在此中国踏上复兴之路的过程中”,所必然“引起的反动而已”^[37]。

“民族复兴”需要有具体的复兴之法,国民党在此方面也有论述。1936年“双十节”,蒋介石发表“中国之统一与建设”的论文,对“农村经济的复兴”问题予以强调,指出中国的建设不止经济一途,“行政效率之促进,公共卫生之推广,义务教育之实施,

及财政之改良”,都将促进国富民强,中国的富强也将对世界的和平、安定创造良好的环境^[38]。《中央日报》社论指出,应当“时时记取总理心理建设之遗教,淬励奋发,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安定国基之工作”^[39]。邵元冲对充实民族力予以强调,告诫国人必须深切认识其重要性,指出“惟有充实民族力乃为救亡复兴之原动力”^[40]。

也有人对辛亥革命精神予以强调,将其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之法。1934年“双十节”,邵元冲在演讲中表示,在国难时期纪念国庆、纪念先烈、为民族复兴的奋斗,“就可以鼓励我们的自信力”,只要我们“以先烈的精神为精神,以先烈的奋斗为奋斗”,一定能得到“民族的生存与复兴”^[33]。

总之,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“双十节”纪念,在延续民初纪念形式的基础上,也出现了新的变化。为了训政的需要,国民政府的“双十节”纪念趋于“党国”化,不仅“党国”符号大量出现于纪念活动中,纪念场地也打上了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烙印,而且在“双十节”纪念话语中,原先纪念中叙述先烈的历史也逐渐被国民党的建国历史所代替,党与国紧密结合在一起。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,国难日益加重,救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,国民政府在“双十节”纪念活动和话语中对救亡予以凸显,并利用救亡凝聚民心进行民众动员。与凸显救亡相伴随的是,民族复兴问题也是国民政府此间在“双十节”纪念中强调的重要问题之一,它不仅将辛亥革命阐释为民族复兴的端始,将民族复兴表述为孙中山的未竟之业,而且还提出具体的复兴民族之方策。

注释:

①关于民国“双十节”纪念的研究,目前可见的成果主要有五篇,它们是:姜瑞学《北洋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塑造——以“双十节”为中心的考察》,《聊城大学学报》(社科版)2006年第3期;李学智《政治节日与节日政治——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》,《南京大学学报》(人文版)2006年第5期;郭汉民等《民国元年国庆纪念活动述略——以〈申报〉为中心的考察》,《历史教学》(高校版)2007年第7期;何广《分歧的解读:纪念中的“辛亥革命”(1912—1949)》,《湖北社会科学》2009年第1期;何卓恩、周游《“共和”与“革命”:民初“双十节”阐释之演变》,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1年第1期等。前三篇主要考察民初“双十节”纪念活动过程及其对民众的影响,没有涉及抗战时期;第四篇以整个民国时期辛亥革命纪念中的解读分歧为考察对象,虽涉及抗战时期,但只是点到为止,并未展开论述;第五篇以民初“双十节”之阐释为考察对象,论述了在阐释中由“共和”到“革命”这一转变过程。而国民政府建立后,“双十节”如何纪念,还未有人论述。本文即将视角放在这一时期的“双十节”纪念上,以弥补这一缺憾。

②关于“九一八”后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,郑大华、黄兴涛等学者都有研究。他们都认为是“九一八”的民族危机促使了这一思潮的兴起。黄兴涛甚至将此思潮的发源追溯至19世纪末孙中山提出“振兴中华的口号”,到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,此观念逐渐流行,“九一八”后形成一股思潮。参见黄兴涛、王峰《民国时期“中华民国复兴”观念之历史考察》(《中国人民大

报》2006年第3期第129页)及郑大华《“九一八”后民族复兴思潮》(《学术月刊》2006年4期第11页)两文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何卓恩,周游.“共和”与“革命”:民初双十节阐释之演变[J].社会科学研究,2011,(1).
- [2]首都庆祝双十节纪盛[N].申报,1927-10-12(9).
- [3]首都国庆纪念大会之盛况[N].中央日报,1928-10-12(2).
- [4]今日正午万众在东校场热烈庆祝中华民国诞辰[N].广州国民日报,1929-10-10(6).
- [5]海军两舰下水[N].申报,1932-10-12(4·13).
- [6]今日全市欢祝双十佳节[N].民国日报(上海版),1928-10-10(3·1).
- [7]全市热烈庆祝国庆盛典[N].民国日报(上海版),1929-10-10(4·2).
- [8]前日国庆纪念大会[N].申报,1930-10-12(4·13).
- [9]民国成立廿五周年纪念[N].中央日报,1936-10-10(1·3).
- [10]省党部为庆祝国庆告民众书[N].广州国民日报,1929-10-10(4).
- [11]国庆二十周年纪念市党部告同志同胞[N].中央日报,1931-10-10(2·1).
- [12]国庆日蒋中正敬告同胞文[N].中央日报,1928-10-10(1·4).
- [13]贾伯涛.庆祝双十节的意义和以后的希望[N].民国日报(上海版),1928-10-10(2·3).
- [14]熊式辉.纪念十七年的双十节[N].民国日报(上海版),1928-10-10(2·3).
- [15]慎予.死后的责任与今后之努力[N].民国日报(上海版),1928-10-10(2·1):社论.
- [16]蒋中正.今后我们努力工作的二条路[N].民国日报(上海版),1928-10-10(1·1).
- [17]纪念国庆要誓血国耻[N].中央日报,1931-10-06(2·4).
- [18]国难严重中双十节气象冷静[N].中央日报,1932-10-11(2·3).
- [19]今日各界庆祝国庆[N].申报,1933-10-10(21).
- [20]中央举行国庆纪念[N].中央日报,1931-10-11(1·3).
- [21]全市庆祝国庆纪念[N].申报,1934-10-12(12).
- [22]国难期中之国庆 各地扩大抗日宣传[N].民国日报(上海版),1931-10-10(1·2).
- [23]杭州各界国庆纪念大会[N].民国日报(上海版),1931-10-10(2·2).
- [24]芜湖双十节各界开抗日大会[N].民国日报(上海版),1931-10-10(2·2).
- [25]中宣部告国民书[N].民国日报(上海版),1931-10-10(1·4).
- [26]刘峙.双十声中国庆与国难[N].民国日报(上海版),1931-10-10(2·2).
- [27]国难声中之国庆日[N].中央日报,1932-10-11(2·3).
- [28]孙科.国难中的国庆纪念之希望[J].中央周报,1932,(228):8.
- [29]立法院举行国庆纪念[N].中央日报,1932-10-11(2·3).
- [30]叶楚伦.振奋起死中求生的精神来解决严重的国难[J].中央周报,1932,(228):12.
- [31]社论.国难中之国庆[N].中央日报,1932-10-10(1·2).
- [32]万众欢腾齐祝国庆[J].中央周报,1929,(71):1.
- [33]首都各界国庆纪念大会[N].中央日报,1934-10-12(2·3).
- [34]蒋委员长在陆军官校洛阳分校国庆纪念暨军训开学典礼讲话(1934-10-10)[G]//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.中华民国史事纪要(初稿).台北: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,1988.
- [35]十九年国庆纪念宣传要点[J].中央周报,1930,(120):21.
- [36]中央国府昨举行国庆纪念会[N].中央日报,1933-10-11(1·3).
- [37]首都各界昨举行国庆纪念会[N].中央日报,1935-10-11(2·3).
- [38]蒋院长发表论文“中国之统一与建设”[N].中央日报,1936-10-10(1·3).
- [39]社评.光明之来日——共祝今年之国庆[N].中央日报,1936-10-10(1·3).
- [40]充实民族力与民族复兴——邵元冲为民国二十五年双十节作[N].中央日报,1936-10-10(1·3).

[责任编辑:凌兴珍]